

Globethics Repository



「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劉靜庵之研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IN, Ken Pa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6 16:21:1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77

「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

——劉靜庵之研究

曾慶豹

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

——周易

大塊噫氣嗟勞苦，帝天無言遂生求

——劉靜庵

一、

在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上，以「革命者耶穌」或「革命的基督教」來理解這樣一個「外來」的宗教，必須從晚清一個非常知名的革命團體或組織說起，它即是以武昌高家巷基督教聖公會聖約瑟堂為基地的「日知會」。一九八三年七月，一群日知會成員因丙午之獄落難之後出獄的張難先、梁鐘漢、吳貢三、殷子衡等故地重遊，於日知會舊址建紀念亭，刻碑以紀日知會事蹟，部分碑文茲錄如下：

故日知會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蓋日知會為聖公會創立，聖公會奉行基督教，其教義以博愛救世為旨，構一天國，勉人之向善，意量駭遍宇宙，罔有封畛，犯難前進，靡頂不

辭，耶穌生時，方丁猶太民族衰弱，羅馬摧殘暴恣，愛倡導革命，求復平等自由。故傳教雖久遠，而革命性仍保持未失。吾黨憤清廷之淫虐，漢族呻吟其下，日瀕於危亡，期為一旅之剪除，與耶穌革命之志相符。聖公會即本教旨，續基督之緒，設日知會，進而為吾黨援。此足證基督教之偉大，主持聖公會者之賢明，勇於赴義也。¹

關於日知會，它在歷史書寫上的命運同樣是坎坷的。自辛亥革命成功並締造民國的過程中，它們的成就與史事一再的被國民黨內的其他革命團體給排擠，在國民黨的「歷史解釋權」下，興中會及同盟會被視為正統，對於武昌起義作為辛亥革命的「首義」並成功推翻滿清的日知會，未獲得公平的評價，從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書於被禁止發行即是最佳的佐證，該書正是一個親身參與革命並是日知會重要的中堅分子所述的歷史，正是因為目睹於革命黨人之間的鬥爭，晚年潛心修佛，不再涉事。²晚近，學界越來越多的歷史論述開始對日知會予以應有的評價，從賀覺非的《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到馮天瑜的《辛亥首義史》，對其中參與的武昌首義的人物都給予肯定。³

1. 碑文歐陽瑞驊撰寫，張難先手書。現該亭僅餘基座，石碑藏湖北省博物館，複制品可見於是日知會舊址：武漢市武昌崇福山街33號。

2. 《武昌革命真史》一書曾於一九三〇年出版，書中對日知會有許多極為珍貴史料上的記載和史事上的陳述，可是很快就被查封和燒毀，被列作禁書，此書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在上海書局重新影印出版。《武昌革命真史》保存着極為豐富的史料，不僅作者曹亞伯本身即是參與了日知會和武昌革命的重要人士之一，該書還全文刊錄了包括當時一些革命宣傳的小冊子原作如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吳貢三的《孔孟肝心》等，以及重要的照片、記錄、手札等等。關於曹亞伯的相關理解，見政協黃石市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先驅曹亞伯：紀念曹亞伯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黃石文史資料第十九期，1995）。除了《武昌革命真史》，另一值得參考的著作即是同為日知會成員的張難先，著有《湖北革命知之錄》和《湖北丙午黨獄匯紀》，均已收入嚴昌洪等編，《張難先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3. 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82）；馮天瑜，《辛亥首義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日知會原是一個宗教團體，可是之後卻成了一個革命團體。⁴日知會是一九〇一年由黃吉亭牧師在武昌高家巷中華聖公會聖約瑟教堂成立的一個「書報閱覽室」，之後由胡蘭亭牧師接任，黃吉亭則到了長沙如法炮製一個日知會，之後胡厚齋牧師也在九江成立了這類閱報室，事實上即是向軍學兩界散佈革命書籍和思想。很快地，像日知會這樣的組織，從武昌為基本，接着就如此地擴散出去，九江、漢口等，以作為傳播革命思想的場所，結合了有志一同的革命人士加入，影響所及，除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川、新疆等地。⁵

在聖公會主教吳德施（Bishop Logan H. Roots）的掩護下，日知會獲得空前的發展，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即是著名的「丙午黨獄」之災而死在牢裏主張「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⁶的劉靜庵，日知會是他「獨力締造之革命機關」，上述碑文形容「靜庵性沉毅純潔，負責任，對閱書報者，各乘間灌輸革命大旨」。從組織到宣傳或演講，劉靜庵成了清政府卻速補的頭號人物，其中不僅他個人的基督徒身份引起關注，也因為教會在援救他的行動上發揮了極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在

4. 殷子衡深入地作過了對日知會與基督教聖公會的關係說明，見《武昌日知會與耶教之關係》（手稿），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近史所檔案室。

5. 相關的論著參見日本學者川村規夫，〈日知會的革命活動〉，載《近代史研究》4（1994），頁108-126；康志杰，〈尋覓「丟失的記憶」：辛亥革命時期武漢暨長沙聖公會基督徒參與社會變革活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5）；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319-351。

6. 殷子衡，〈皈依基督自述〉，載何卓恩編，《殷子衡、張純一合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39；按此書原於一九三一年武漢鄂湘五運委員會出版，題為《殷子衡先生皈依基督自述》。另可參見〈日知會列傳〉之「劉靜庵」，載賀覺非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9；湖北省圖書館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近期出版了第一本以傳記體撰寫劉靜庵生平的著作：廖聲武、吳位瓊著，《中國民主革命先驅者劉靜庵》（武漢：長江出版社，2010）。

思想行動方面，相當程度地表現了「革命的基督教」的色彩，本文即特別針對此一面向予以論述。

二、

日知會成立開會之日，劉靜庵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

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外人要瓜分了，我們同胞又要做兩重亡國奴了。滿清納拉氏常言並將中國妄於外人，不可失於家奴，此滿清亦自認為中國又要在亡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被滿清壓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現在禍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為人之奴隸牛馬，不勝極切盼禱之至。日前同志曹亞伯由湘來鄂，與胡蘭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議擴充日知會。現曹君已往日本從事運動。我們日知會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備就，應成立幹事部。此幹事部多軍學兩界人士，俾黃帝子孫不復亡國奴，豈為同志知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知幸。⁷

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一直都是中國近代革命的核心思想。以日知會為主的基督徒革命黨人也不例外，基本上仍然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革命，但他們仍在基督徒的信仰前提上找到解釋，如曹亞伯在教堂中說過「滿清入關滅我漢人之罪惡。實為上帝所不許」這樣的「神學式解釋」。⁸

在日知會成立之前，與之相關的，可以追溯到「花園山」的聚會。花園山是位於武昌城內東北角一片幽靜的小山丘，外國教會和組織多集於此，即今天的華林。劉靜庵當時就已參加了由吳祿貞所召集的活動，地點就在李廉方

7.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14。

8. 同上，頁5。

的寓所，此處的聚會除了演講、討論外國新知、發放革命宣傳品外，他們還有一部幻燈機，播放一些世界民族運動和反抗被壓迫的現況，吸引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參加。⁹花園山的聚會只有短短的數個月就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多寶寺街時象晉寓所的「科學補習所」，據說這個組織成立了一九〇四年七月三日，相對於花園山的聚會，這個組織還算比較嚴密，之後遷到了武昌魏家街一號，雖然當時劉靜庵仍然在新軍黎元洪之下當書記，但已非常投入於其中，並召集了不少投軍的青年學生加入，也商議過謀刺清政府官員的計劃。¹⁰科學補習所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因張之洞的緊密搜查行動下也隨之解散，這個組織活動前後不過四、五個月就結束了，隨之，劉靜庵就躲到高家巷聖公會去避風頭。¹¹

劉靜庵來到聖公會聖約瑟堂之前，日知會早已存在，但它的性質很單純，以「日求一知，不斷進步」的精神，提供外國最新書報，以利民智之開放。武昌高家巷的聖公會聖約瑟堂可以說是美國聖公會在武昌開始傳教時所興建的一所教堂，然而，日知會最初以書報閱覽室的「日知堂」名義成立，則是於一九〇一年由當時擔任吏職的黃吉亭牧師所設立的，為首任的日知堂的會長，次年因黃吉亭調任長沙而由胡蘭亭繼任之。

一九〇三年，劉靜庵就已經踏足這間閱覽室，結識胡蘭亭，同時也召喚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加入，包括曹亞伯、

9.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辛亥武昌首義紀》（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1），頁 1-4。按：本書的作者應該是李廉方，原於湖北通志館出版，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台北的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重印本書時並未對此加以說明。

10. 伏名，〈科學補習所之歷史〉，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等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 3-5。另可參見范鴻勳，〈日知會〉，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頁 76-81。

1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辛亥武昌首義紀》，頁 5。

張純一等，在以書會友的環境中，認識了基督教信仰，並紛紛受洗入教，漸漸地，在此集結了越來越多具有革命熱情的分子，在劉靜庵擔任該會的司理之後，日知會開始展現其革命團體的形象和功能。

從一個閱覽室變成了革命團體，其中最為關鍵的即是劉靜庵與胡蘭亭之間的互動。日知會的轉變，劉靜庵固然是個關鍵人物，但中間卻是說服胡蘭亭的結果，劉靜庵的話是這麼說的：

國勢誠岌岌矣！公中國人當不忍其倫胥；下走愚妄，竊願借此謀革命以救國，公能許我乎？

劉靜庵特別提及了聖公會人士在道德和信仰的前提下是會支持革命的，而且，更是在此中國的危難時期，基督教的救世精神更應獲得實踐。正是這段說詞打動了胡蘭亭，胡蘭亭應之：

國危至此！尚何所顧慮？願與君共為其難，即君言，第好為籌劃也。¹²

就這樣，劉靜庵獲得了胡蘭亭的全力支持和掩護，日知會以教會之名謀革命之實，自此開始。作為一個革命團體，其成立的時間學界普遍認為是在一九〇六年。

許多與日知會相關的評述者如張難先、曹亞伯、張純一等人，都認為在劉靜庵的個人能力和才華的組織、推動下，日知會取得了空前的發展：

12. 〈日知會始末〉，載嚴昌洪等編，《張難先文集》，頁 89。胡蘭亭和黃吉亭受到革命黨人極高的崇敬，從他們的人格表現上，稱道作：「異哉，宗教博大深厚之旨趣，何其入人之深哉。」（見嚴昌洪等編，《張難先文集》，頁 103。）

敬安視事後，整理書報，訂立規則，應接尤為周至。數月之間，閱者日眾，閱覽室為之改觀。敬庵見擴張會務，大可引導革命，始則漸增革命書報，繼而吸引同志，進行組織。於是商准胡會長，擬製會約，名不變而質變，由傳教進而革命，是為日知會開始演變，時在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冬也。

是後每星期日必有類是講演，有時假座文華書院，請名人講演世界革命史事，對時事常含刺激意味，如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朱作梅等皆曾主講。又在黃州設秘密印刷機關，由吳貢三、殷子衡負責校印革命書冊，各處攜以分送，各校學生幾於人手一冊。¹³

劉靜庵機警、鎮定，沒有給政府留下任何垢病之處，而且，由於他的熱忱與投入，日知會的成員均表現得極為團結一致，使參加者也比較放心，亦不給教會帶來麻煩。曹亞伯尤其稱許劉靜庵，認為他一個人可抵作一千個人用：「焉得劉靜庵，化身千百萬，使舊腐之人物，一一覺悟哉」，因此，日知會在劉靜庵的推動之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軍學兩界之入會者，數約萬人」，¹⁴也應證了熊十力的話：「識者知其非常人也」。¹⁵

日知會成員，每藉星期天禮拜或在文華書院中的演場合，無不宣揚革命思想：講述世界大勢，分析本國危機，指明未來方向。據許多的回憶認為，劉靜庵的口材極為激烈和感人，聽者無不深受感召，甚至激動得落淚，如熊十

1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辛亥武昌首義紀》，頁5-7。

14.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130。

15. 熊十力，〈日知會王劉余何朱諸傳〉，載蕭蓬父編，《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3。

力形容作：「每開會演說，敬庵至誠惻怛，聲淚俱下，環聽者常數百人。數月，黨勢益熾，日知會支部林立」。¹⁶

三、

一九〇六年，日知會接待了一位經由孫中山介紹指派來自法國的歐吉羅先生，準備一次公開的演講，講述國外的革命思潮與現況，劉靜庵負責接待和主持演說會的工作。正是這場演講，給當時的巡警馮啟鈞給盯上了，就在一次萍鄉、醴陵起義失敗，其結果是一併地將日知會成員包括朱松坪（子龍）、張難先等九人捉到牢獄中。其中，又以劉靜庵受到最為嚴重的拷打與盤問，「鞭背至一千四百下，肉盡見骨，面目青腫」，單獨囚禁，¹⁷想盡辦法就是要指認他即是黃岡縣革命黨人首領劉家運。¹⁸

吳德施等聖公會教友為劉靜庵等九人奔波努力，極力要援救他們，包括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美國佈道家穆德（John R. Mott）等人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交涉，鼎力協助他們脫困。吳德施在信中，對劉靜庵的人格表示了敬佩之意，除了陳述與他結識的經過和觀感，更是對的基督教救國主義予以高度的肯定：

余抱基督教救國主義兩年於茲矣。以此兩年來，國內所
經歷之禍患備至，亦信此主義之足以救吾國。蓋非直救吾國
而以也，世界之國皆將以此救之。救國者云，其義有三：始
於救人，中救於國，終於救世之謂也……

16. 同上。

17. 殷子衡，《獄中日記》，載何卓恩編，《殷子衡、張純一合集》，頁11。

18. 關於劉靜庵是否即是劉家運，曾經有過這方面的爭論，馮自由對此作過討論，有說他們兩即是同一人，張難先則指稱不是，之後確實是逮到了劉家運。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3）。

然試讀新約聖約翰第十一章之四十九節至五十一節（原文不錄），則知基督教之救國實有真諦。夫基督教之救人救世，此人所習聞者也，獨不思人與世之間上有國位於其中乎。合人群而成國，合國群而成世，未有救其兩端而其舍其中者。

從吳德施的信札中可以更多地認識到劉靜庵，他非常肯定劉靜庵的人格和信仰的真誠，甚至用孟子來形容他的傲骨，並呼求全中國教會為劉的遭遇和處境祈禱，希望他早日脫困：

余之識先生，始於一千九百零四年，初先生以慕道來本會，繼而明其志願，盡舉所有用，以鼓吹道德之文明，開啟同胞之知識，是即先生在本會所設日智（知）會。辦事始末之一斑，未幾千九百零六年春，鄂文華神學校，苦無相當之教習，時蒙慷慨允求，願日盡義務一小時，自餘識之始至今日，學生自受教之始至今日，愛之美之之心，未嘗稍退……是年，風潮大起，官示四布捕逮劉家運（述被捕經過，略）……孟子所謂天將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語，其為先生而言呼。願主旨成，更切望在中國之全體教會，為吾人所敬愛之弟兄劉敬庵祈禱，並祈懇全能慈善之上帝，施恩慈與憐愛，使其早得釋放，服事主之教會於中國。¹⁹

19. 劉靜庵等革命人被囚在獄中時，吳德施主教夫人在美國教會英文刊物《傳教精神》（*Spirit of Mission*）一九〇九年十月號上以〈劉靜庵——囚犯〉（Liu Ching-an: A Prisoner）為題發表文章，文中介紹劉靜庵是一位品行高潔、博學愛國的基督徒，受到學生的熱烈愛戴，文中寫道：「他仍在獄中為囚，我們心中充滿着對這位無辜的囚犯的同情和對那些酷吏、叛徒的義憤。」另可參見，王成勉〈吳德施主教與清末革命運動〉，載李志剛編，《辛亥革命與香港基督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頁175-186。

劉靜庵被形容為這樣一個人：

性沈毅寡言。務躬行實踐，不尚空談，平生莊敬自持，無一息懈，雖盛晴未嘗去衣冠。動止皆有常態，與人交，久而敬，嚴毅誠摯，儼然可憚，然相接既久，則覺其藹然可親。²⁰

他的人格被刻劃作：

坐如銅鑄，行如滿載船，雖病甚，不晝寢；雖緊急，仍從容；暴烈之容，不見於面，叱吒之聲，不出於口；人喜亦喜，人憂亦憂。

賀覺非在編著〈日知會列傳·劉靜庵〉一文中，提及他的材料主要參見自張難先和胡蘭亭之作，特別提到胡蘭亭作有《獄中信徒》一書，認為此書對劉靜庵多為誇大之詞，不足採信。然而對照過曹亞伯、張難先、張純一、殷子衡等人的描述，賀覺非的判斷實為一種偏見。我們從熊十力對劉靜庵的印象可以證得胡蘭亭等人之美言絕非不實，熊十力從其幼年開始，形容其「幼隨父讀，穎悟善記，書過目輒不忘。性沉靜無譁，喜坐小樓靜讀，寒暑不輟，非膳不下」。²¹

最為感人的故事，是經由在獄中被他規勸信教的殷子衡轉述出來的。劉靜庵在獄中讀經、禱告、講道、唱詩，劉靜庵第一次向同是與他因搞革命而受牢獄之災的殷子衡

20. 姚漁湘，〈劉靜庵傳〉，原載《三民主義》半月刊（第十卷第八期），後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先烈先進傳》（第一冊）（台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

21. 熊十力，〈日知會王劉余何朱諸傳〉，頁13-14。

佈道時說，「維摩結病在斗室，佛法及於三千大千世界；耶穌降生馬槽，福音傳播地球南北兩極。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求救中國的苦難，身在縲紲，心在天堂」，之後他提到福音書的內容，認為其中最為精要之處即是表示：

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國家，可以救世界。你要趕快皈依基督。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工夫，不要蹉跎復蹉跎，像那幾個假革命黨，把我們騙到監牢裏來坐，他們就高飛遠走。……我們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自做真基督徒。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呢。²²

在這些「信仰耶穌的革命黨人」心中，他們經常告誡自己準備為革命付出代價，其精神或動力源於耶穌的一段話：「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殷子衡也認為，信靠基督即是自度度人，並求天國實現在人間，受到劉靜庵的感召，他認為《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5-45 節那段耶穌的教訓，即是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互助主義的先導。²³

從張難先給劉靜庵前後刻的碑陰和墓誌的內容看來，與你同時代的人對他的人格和精神均有極為崇高的敬仰之意，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無國界、無種族之分、人不少無貴賤、無尊無卑，形容他為「革命完人」。²⁴同為革命黨人的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形容劉靜庵是日知會的核心人物，「焉得劉敬安，化身千百萬，使舊腐之人物，一一覺悟哉。敬安作事最機密而沈靜，與日知會幹部諸同

22. 殷子衡，〈皈依基督自述〉，頁 38-39。

23. 同上，頁 42。

24. 張難先，〈新刻烈士劉靜庵先生碑陰〉、〈新撰劉靜庵烈士墓誌共跋〉，載湖北省圖書館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頁 85-90。

志關會議，秘授宣傳革命之方法。……劉敬安擴充日知會之成績，於法人歐吉羅未來演說之前，軍學兩界之入會者，數約萬人。」²⁵

曹亞伯描述劉靜庵在武昌模範監獄所受之苦痛，「非筆墨所能形容」，關於劉的死狀，殷子衡的記述中有過令人震撼的場景：

劉公敬安平日一念慈悲，與受難之眾囚，感情甚厚，死時皆撫屍痛哭，如喪考妣，且賁托獄吏報告高家巷聖公會。中西牧師，聞耗哀痛，迅至獄中，清尸殮葬，蓋恐獄吏暴戾，棄尸於野也。獄官初不之允，固請而後許，遂昇至武昌聖馬可教堂厚殮之。入棺之頃，劉之它母，無棺痛哭，暈死者再，幾不知其子之真相。蓋骨瘦如柴，年僅三旬餘，而鬚髮盡白，其為國所受之苦，可以想見。今尚窆於聖公會之塋地焉。劉公敬安，名貞一，道號保羅，家運其別字也。籍湖北安陸府潛江縣，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²⁶

劉靜庵死於辛亥年五月十六日，距武昌起義不過是三個月，無緣親眼見到他勝利的到來。殷子衡可以說是受劉影響最深的一位革命黨人，以下這段話完全可以做作劉的基督教革命思想的注腳：

欲救今日百孔千瘡的中國，非富有博愛的胸襟、熱烈的情感、服務的志向、犧牲的精神，決不能成功。這四種特點，又都孕育於基督教內。²⁷

25.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130。

26. 殷子衡，《獄中日記》，頁16。

27. 殷子衡，《皈依基督自述》，頁22。

劉靜庵無論就人格或學問上，備受他同時代的人的贊賞，同是日知會成員的熊十力，曾說過以下這段話：

日知會諸子，多不羈之才。而王漢、劉靜庵、余仲勉、何見田、朱元成皆天資過人，立身有本末。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而敬庵尤卓犖，遒皆以年少遭慘變，不得竟其學，展其才，惜哉！²⁸

熊十力所述絕非虛言，劉靜庵在獄中留下了令人稱奇的《獄中讀書日記》，可知其熟讀《明儒學案》，對其他儒家的經典都非常的熟悉。²⁹最難能可貴的是，這短短的稿本，其中除了精彩的詩句外，還有嘗試表達了與基督教思想融通的觀點，其中〈耶穌復生天人之證〉和〈耶孔異同宜何適從〉，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章，他不僅比較了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異同，他所表述的宗教思想，更是透露出其革命的思想，信仰體悟與革命實踐相互應。

四、

劉靜庵的獄中筆記，摘錄《明儒學案》的部分並不多，大多數的篇幅是在論及基督教的部分，從他的文字表達來看，這些作品可以算得上是他的靈修之作，論及人的罪、愛、信德、重生、事奉上帝、祈禱等基督徒生活的基本道理。劉靜庵對於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也是熟悉的，他懂得聖餐的道理（「以聖餐與主交通」）、道成肉身、神人二性、

28. 熊十力，〈日知會王劉余何朱諸傳〉，頁11。

29. 于必昌、農偉雄整理，〈劉靜庵獄中讀書日記選〉，載《中國哲學》第十三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14-338。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作。按此文原稿收藏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哲學》第十三輯刊出的，僅僅是該文原稿的三分之一而已，此文件極為珍貴，無法取得照相或翻拍之許可，只能以抄寫的方式待將來有機會公諸於世。本文文末附錄這份稿件的目次，供學界先進賞析。

三一的教義、上帝國、耶穌復活的真實性，甚至對於《新約》《舊約》之別有精確的說法：

舊約以律，新約以愛；律服者奴，愛懷者子。

可謂深悉保羅神學之精髓。

劉靜庵這篇獄中筆記可以比美德國納粹期間被捕入獄的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反抗或服從：獄中書信》（*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其精彩之處有兩方面：一是對上帝之言有確切的神學把握，一是對耶孔之異同進行了比較。這些極具神學洞見的見解，無疑的，都看出劉靜庵不僅在各知識學識方面聰明過人，在信仰的執着和敬虔度上也是令人感佩的。

熊十力稱讚劉靜庵絕非虛言，劉自己簡述了他的學思歷程：

少雅不善辭章學，承父師庭訓，讀書以躬行實踐為本，五經、四子、學案、語錄，自幸未嘗只作文字看過，為往聖繼絕學，庸常有志焉；稍長旁及佛它諸子，抉精剔髓，覺王陽明先生只爭些子之語，猶近門面；既又得耶教之新舊二約讀之，疑久，久之抉雲而覲青天，憬然向者只是在景月下旋轉，乃今杲日當空，四通八達，侈訝乾坤如是其廓落，始嘆精純奧極，得未曾有。³⁰

在〈耶孔異同宜何適從〉一文中，劉靜庵批判了名、利、肉欲方面的人性被物化的弱點，這些表現成了奴役人

30. 〈劉靜庵獄中讀書日記選〉，頁335。

的力量，人從根本上喪失了人的價值與尊嚴，「筋骨」。面對如此世風日下的局面，無不傷心、失望，「聖道久絕，如固處黑暗陋者，乍臨之以旭日，其不差澀眼淚而目回護藏者，其勢蓋不可得也」。³¹可見劉靜庵是經過一些個人的體會，再觀照中國的歷史現實而作出上述的判斷，因此對於他而言，只有耶教才能幫助中國人克服自私自利的行為。

劉靜庵寫到：「人之言為上帝像；但當知上帝之言非如人言。上帝以事顯其意，如人之行，意在其中則行亦言也。太初，上帝以言造成萬物，治天下，發明天理人心，將來亦以言審判萬人，上帝之言不朽，言出惟行，非徒然而言，其言如火如劍如燈。竊上帝言者必攻之。敬虔之士當勿忘上帝言。耶穌遵父命而言，有永生之言，天地可廢，其言不可廢。」上述這段文字可以說是許多經文的歸納，貫穿着《舊約》和《新約》中涉及到上帝之言的描述，而且，前後一貫，思路清晰，嚴然具有一種「上帝之言」的神學體系之姿，頗有巴特主義的基調。

作為一個革命的實踐者，劉靜庵把握了基督教博愛和大公的思想，隱約地批評了中國的血緣主義，認為後者的思想是狹窄的，不僅造成人與人之關係的自私自利，同時還是一切社會混亂的根源，他說：

惟愛之量，則充乎宇宙；施愛之序，則先及信道。親之以信德而不以血氣，故其道大公而無偏私。中國親之以私，乃成亂天下之因。觀於耶穌親親仁民盡情盡理之純全，遂相形而見隘矣。³²

31. 同上，頁333。

32. 同上，頁323。

他認定，中國古代的天命之學，實為「公義」兩字，故言「公義永彰，此大人畏天命之義歟」。作為革命黨人基督徒，劉靜庵從三一演繹出一種超越血緣的主張，他說：

同事一上帝，同行一耶穌，同得一聖靈，是義理之至親，
天倫之骨血也。篤義理之親，血氣之親乃克篤；篤血氣之親，
義理之親未必能全。人情篤於夫婦，而忍於兄弟，血氣之親
可概矣。故以義理為維繫，無疏不親，無倫不瀆。³³

劉靜庵面對此巨大的牢獄之災，身心難免陷入極端的痛苦，然而，從其獄中的筆記看來，支撐着他的，即是他內心的篤信，我們很難從其文字中找到痛苦或舉喪之詞，相反的，處處流露出無比的信心，也難怪他的表現甚至感動了獄卒也歸信基督教，宛如當年保羅所為的那樣，熊十力形容他「非一般之常人」，絕非虛言。

在這些筆記中，劉靜庵提到最多的是信心和祈禱。「祈禱之於上帝，有如呼吸之於人身，上帝為人身生命之原。人身不能離呼吸而存，生命不能離祈禱而在」；「信德之於人有如手然，受物於手，受恩以信。……信者人之光也，宜純一常存，亦人之鹽也，宜力行是功，純一而力行，物未有能惑而移易者，是真信德」。從這些親筆文字，可證與殷子衡在回憶中所述的劉靜庵可謂完全一致，幾近完人，是中國基督徒中的「聖人」。³⁴

被形容作「坐如銅鑄，行如滿鐵船」的劉靜庵深陷於此牢獄之災中，也難掩內心情感的痛，他在獄中特別的表露了對母親的掛心和思念：

33. 同上，頁319。

34. 有幾本書都大肆讚揚劉靜庵的聖徒人格，包括了胡蘭亭的《獄中信徒》和《劉靜庵》，以及殷子衡的《中國基督教的兩大偉人》，可惜到目前為止仍未見到這些書。

兒切切禱告，求主安慰我母親之心。兒知道這世界的苦樂，都是暫時的，也是虛假的。且享這暫時虛假的福，必要受那永遠真實的苦。受這暫時虛假的苦，必要享那永遠真實的福。³⁵

我們在這世界，雖受至大至多的苦難，若想到來世在天國裏享受主為自己的兒女所豫備的永福。這世界的苦難，便不足介意了。所以我們應當歡歡喜喜地倚靠主，合着主旨意在世為人，無論教我們怎樣，或苦或樂，都是為我們得救人的益處，我們只好順受，只好求主賜聖靈大能，多多幫助我們。教主的榮耀，無論怎樣，總在我們身上多大彰顯。主是全能的天主，我們靠着主耶穌基督，必蒙成全，阿門。³⁶

在這些信中，劉靜庵勸母親多讀《聖經》，尤其是《路加福音》。劉不斷安慰母親，並提及其兄長，相信上帝會釋放他得自由，請母親一定要全心全意依靠主，多多祈禱。

劉靜庵給家人的信中較為節制，不大談起苦難的折磨。與友人信中，與吳主教一篇描述得較為具體，但信仰顯然讓他在苦難中得到極大的慰安。在〈致吳主教書〉這封信裏，劉靜庵表現出想出獄的迫切心情，懇求吳主教多加救援，但強調通過美使館的力量，對中國政府多有批評。同時，劉靜庵介紹了自己在獄中傳教的經歷，提及了潘季貞與殷勤道兩位朋友。在寫這封信之前，劉靜庵從舊監獄轉移到了新監獄，因此受了苦中之苦，情況比之前更加惡劣。但劉靜庵也因此認識了守衛軍潘季貞，潘常看顧他，劉借機給潘講道。這個故事頗相似《新約·使徒行傳》第

35. 〈寄母之信其一〉（手抄稿）。

36. 〈寄母之信其四〉（手抄稿）。

十六章保羅的經歷。潘季貞與殷勤道均受劉靜庵的影響信仰了基督教，至此，劉靜庵明白了主的美意，他的入獄是為了要在獄中傳教。

劉靜庵堅信，唯有基督教的福音信仰才能帶給這個世界予光明，他的革命實踐即是在此意義下，致力於將中國從黑暗的世界中走出來。經常最為體現他苦悶情緒的是詩歌，也通過詩歌表示了他的祈願，正如他在〈讀凋宋詩醇〉這首詩中所述：

願教呼吸育青清，屐踐天光禮至尊；
一掃塵凡萬古暗，琳琅珠玉播福音。³⁷

五、

辛亥革命親歷者楊玉如對日知會作了如實地評價：

當時會員結合，主要任務在灌輸知識，喚起革命，其發動指導，尚無大規模計劃，即軍營內部運動，亦無系統組織；但主其事者皆一時之秀，苦心孤詣，奔走呼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實已盡宣傳之任務。惜死者死，囚者囚，存者皆風流云散，似乎靡所成就；然植根播因，於辛亥革命影響實甚巨也。³⁸

同樣是日知會的成員並做了不少重要「革命歌曲」、之後主張「佛化基督教」的張純一，形容日知會是「丹誠水災救斯民，耿耿耶穌博愛心。覺世先施日知會，廣陳書報引

37. 〈劉靜庵獄中讀書日記選〉，頁332。

38.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頁6。

軍人」，³⁹道盡了此一革命團體實源於基督教精神。張純一提及了對基督教革命思想的認同，他認為「基督教本為革命之教，耶穌乃最大之革命家」，「真革命而非之，毋乃非耶穌之道乎？」，作為一個具有深厚中國文化學養背景的學者，張皈依基督教並受洗，完全是基於他對基督教的革命精神或思想的認同，亦提及劉靜庵：

基督教敬天愛人，必慎其獨，不辨婦孺，皆可實踐，信可率人以共由。

乃受洗禮於聖公會，以欲革新國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適新黨人集鄂垣者日眾，潛江劉敬安，志士也，謀就聖公會重組日知會，寓革新之意於教會，屬餘為文，且以拙作軍歌鼓吹其間，一時同志來會，甚盛也。⁴⁰

張純一從創造論的意義來理解革命即是造化，造化同時必然包含了破壞，而且，認為耶穌的主張即是天國主義，這個教義包括了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精髓在內，其思想即是「打破私有制度為極則，故有誠命雖能遵守猶必須變賣一切所有始能入天國之訓」，「故凡宗仰基督者，當富平等思想，改造世界，革政治不良之命，促其進化，庶不玷基督也」。⁴¹他解釋了《聖經》中的思想和人物，認為耶穌是一個貧窮者、無產者、殉道者，《使徒行傳》主張共享和濟貧、《哥林多後書》主張均平、《馬太福音》主

39. 張純一，〈日知會之創立與丙午之獄及辛亥之首義〉，載何卓恩編，《殷子衡、張純一合集》，頁95。

40. 張純一，〈述歸命基督之由阪對教會之觀念〉，載何卓恩編，《殷子衡、張純一合集》，頁102。

41. 張純一，〈改造基督教之討論〉，載何卓恩編，《殷子衡、張純一合集》，頁216。按本文曾編入張純一，《中國基督教》（上海：佛教精進社，1927）一書中。

張服務，都無不以天國主義為依循。⁴²

可見，這種思想與帝國主義的思想是衝突的，基督教的價值不僅是一種革命，在中國當時的現實意義而言，同時更是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思想，張純一的說法可以代表那個時期基督徒革命黨人的共同思想，日知會在倡導推翻滿清的主張中，與反對帝國主義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張純一從佛教徒變成基督徒，之後又從基督徒變成佛教徒，唯一不改其本色的，即是對革命的崇尚，當教會與帝國主義無法劃清界線時，教會即是背離了耶穌的天國主義，同時還是革命的最大障礙。顯然，張純一的兩次改宗，都與革命的思想有關，而非關佛法或基督教教義之比較問題，而是實踐之問題。

張純一對於基督教最高的褒揚，即是他的《基督教外篇》，從教育、法政、國民性、家庭等談到與基督教的關係，認為民國的創建在於各個層面的思想改造，基督教是打造一個高素質的國民的精神基礎，總結說：「如上述基督教，有益民國，良非淺鮮。蓋敬天之至，不敢不愛人，而群道由是興。群道與則公能制私，國無不治矣。抑知天道明則人事利，基督教善通天人之郵，俾群據天道以為鵠，欲自淨理自純也。小人日少，君子日多，民國有不強盛者哉！」⁴³不管從那一個面向理解，張純一所理解並刻劃的基督教，即是一種社會主義形態的基督教，他的言論可以說代表着那一個時期日知會成員的共同看法。

無疑地，「革命的基督教」一直是深深吸引着愛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中國基督徒，這條思想道路自晚清以降，從「信仰耶穌的革命黨」劉靜庵、張純一經民國之後

42. 同上，頁217。

43. 張純一，《基督教外篇》，載何卓恩編，《殷子衡、張純一合集》，頁156。

的「社會福音者」吳雷川、吳耀宗、張仕章等，嚴然形成了一支中國基督教激進神學的話語形式。

附錄：劉靜庵獄中書稿目次⁴⁴

標題	抄本上鉛筆字所標頁數	備注
敬庵獄中病後讀書日記 (明儒學案讀提)	1 左	有
耶穌以死而贖人罪	16 右	無
耶穌復生天人之證	19 右	不全
耶穌復生在天上上帝右 在地偕門徒	23 左	不全
苦難六意	27 右	無
苦難十訓	27 右	無
苦難七慰	27 左	無
異跡大意四端	27 左	無
耶穌乘新驢入耶路撒冷 萬人歡呼之頌	28 右	無
救主聖誕美牧師雷德禮 讚美頌	29 左	無
獄中自詠	30 右	無
中秋夜	30 左	有
秋夜感懷	30 左	有
寄友人某	31 右	有
九月初七日移新監作	31 左	有

44. 此獄中書稿曾以〈劉靜庵獄中讀書日記選〉之標題刊載於《中國哲學》第十三輯，由于必昌、農偉雄整理，可惜未全抄錄。以下備註處即標明對照《中國哲學》之結果。

次韻酬答徐君 冬日有感見示	32 右	有
附錄徐君作	32 右	有
和易吟村聞子規因憶見寄	32 右	無
松	32 左	無
竹	32 左	無
梅	32 左	無
寶鑑（劍，異體字）	32 左	無
獄中月夜	32 左	無
出伏	33 右	有
漫答	33 右	有
冶爐	33 右	有
秋夜有感	33 右	有
幾回夢	33 左	有
幾傷心	33 左	有
月	34 右	有
中秋夜	34 右	有
蛛網脫蝶	34 左	有
晨興盥漱畢	34 左	有
讀唐宋詩醇	35 右	有
耶孔異同宜何適從	35 左	不全
獄中書信	41 左	不全
寄余雷黃三先生之信 （小標：余雷黃三先生即 余文卿會長，雷德禮會 長，黃吉亭會長）	41 左	不全
致吳主教書	43 左	無

寄父之信	48 左	無
其二	49 左	
寄母之信	50 右	無
其二	52 左	
其三	53 左	
其四	55 左	
其五	55 左	
寄潘季貞	56 左	無
寄弟	57 右後	無
寄殷勤道	57 左後	無
其二	57 左後	
第七章：劉靜庵著作 救主復活光明節新體文章	58 右後	無
救主聖誕節頌辭二章並序	58 左	無
事主詩	58 左後	無
賜自新詩	59 右	無
求學歌	59 右	無
恭賀	59 右	無

關鍵詞：辛亥革命 日知會 中華聖公會 激進神學

作者電郵地址：chinkenpa@yahoo.com.tw

“Be a Real Christian, Be a Real Revolutionist”:

A Study on Liu Ching-an

CHIN Ken P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What has been mentioned regarding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Xinhai Revolution (1911)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 past mainly focuses on Huang Xing, Sun Yat Sen, Lu Haodong et al. In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which were dominated by Tongmenghui and Revive China society, some key persons of the first revolt who we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Christianity were neglected. Liu Ching-an is a case in point. Liu was a member of Rizhihui (Society of Reading), an organization of Episcopal Church in Wuchang Gao Jia Xiang (Lane). Rizhihui emphas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ity with the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would serve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life and cultivation of Christians. Most people who were influenced by Liu interpreted Christianity in line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us, this article aims to find out how Christianity involved in that significant

revolution through Liu, and to investigate the Christian thought of Liu, which had shaped a kind of radical theological thinking within the modern China.

Keywords: Xinhai Revolution; Rizhihui (Society of Reading); Episcopal Church; Radical Theology

